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第二集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第二集

林 圃 主编
孙连成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邓星盈 王 茜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何 华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第二集）

林 圃 孙连成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 都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6 插页2 字数430千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4118·35 印数：1—2,600

定价：3.70 元

目 录

洞察国情的经济学家马寅初

.....张连元 朱正直 (1)

孜孜不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学文

.....王义侠 王义为 (97)

壮志未酬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沈志远

.....沈骥如 (168)

把毕生精力都献给《资本论》在中国传播事业的

郭大力.....余信芬 郭宝麟 (219)

在商品价值理论上独辟蹊径的经济学家骆耕漠

.....张纯音 (235)

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发展经济

学创始人张培刚.....胡俊杰 谭慧 廖丹青 (290)

致力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陶大镛

.....杨国昌 (346)

对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

学家管大同.....安生 (418)

潜心研究农业经济学与《资本论》的

经济学家漆琪生.....史家骅 洪远朋 (461)

洞察国情的经济学家马寅初

张纯元 朱正直

一 饱经沧桑的一百年

马寅初（1882.6.24—1982.5.10）又名马元善。浙江省嵊县人。现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小皋埠村的一个酿酒作坊主家里，幼年时随父亲迁往茂林修竹景色宜人的嵊县浦口镇居住，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马寅初兄弟5人，大哥继承父业，当了小老板。唯独马寅初最小，且聪明伶俐，父亲十分宠爱，寄希望于他将来能做一番有出息的大事，把家业治理好，生意亨通，财源茂盛。但马寅初志不在此。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丧权辱国，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思想广为流行，年轻的马寅初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深，强烈向往“实业救国”。他不服从父亲对他的安排——当一名小店铺的管帐先生，迫切希望到大都市去继续求学。

1898年，马寅初到上海读中学。由于他勤奋好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矿冶专

业。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宿愿，他刻苦攻读，成绩名列前茅。1906年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到美国不久，由于中国政局变化，官费被取消了，他只好利用节假日到码头做苦力，或给饭馆涮盘子，以维持清贫而艰苦的学习生活。

在美留学期间，马寅初把亲自看到的美国社会制度和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清末时期腐败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经济加以对比，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认识到，在中国单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制度非来一番改革不可。于是，他决定由原来学工科改为研究经济学，以期将来在改革社会经济制度方面有所作为。

在美国期间，他在学业和身体素质方面长进颇快。他的身体素质本来并不太好，由于耶鲁大学规定游泳是必修课，凡不会游泳者，其他功课再好，也不能毕业。因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游泳。在这所大学，他还碰到一位90多岁身体非常强健的美国医生，遂向其询问强身的秘诀。这位老者介绍说，秘诀就是冷水浴。从此以后，马寅初就不分春夏秋冬，长年坚持冷水浴，这是他后来身体健壮，精力充沛，长寿百岁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寅初以他健壮的体魄为条件，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经济学方面取得了成就。当时留美学生有一个得学位的“窍门”，就是在美国写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由于指导老师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和研究，所以很容易获得博士学位。马寅初鄙弃这种做法，他知难而进，偏要选作《纽约市的财政》这样一个高难度的题目。1914年，他用英文写成这篇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该论文在纽约出版，并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作新生教材。

1915年，青年学者马寅初胸怀富国强民的抱负回到祖国。当时他看到的却是满目创伤、军阀混战的局面，因而不愿在政界从事工作。于是他在1916年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后来又兼任系主任，1919年被选为北京大学教务长。“五四”前后，他已是北大的知名教授。在北大任教十多年中，先后讲授过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论、汇兑论等应用经济学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颇有启发性，深受学生欢迎。在这期间，他开始注意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坚持一面教书，一面了解实际情况，同时兼任浙江兴业银行的顾问，同工商界、财政金融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使他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特别是财政金融情况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他发现工商业的经营弊病甚多，财政金融混乱不堪，人们的经济知识十分贫乏，同时也感到在国外所学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难以行通，他决心不去著作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书籍。

二十年代，我国学经济的人很少，大厚本经济学书籍的读者更少，因此，马寅初就以演讲、发表短文的方式，广泛介绍经济学知识，评论现实经济问题。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二百多次，对诸如农业问题、工商问题、劳资问题、国际贸易和关税问题、财政与信用问题、银行与货币问题、交易所、信托公司、公债发行与买卖、外国汇兑和一般的经济、财政学原理都作了阐述，对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实业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演讲词后来汇编成《马寅初演讲集》。它对于人们了解二十年代经济情况，研究当时的经济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时我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关税、对外贸易、国际汇兑等多操于外国人手中，中国人根本不能过问。即使有

几家华商银行与外商竞争，也因资本有限、利率过高而无法与洋商银行对抗，致使大权旁落。他深感中国是多么需要维护主权，又是多么需要传播国际汇兑理论知识！但是，当时没有研究中国对外汇兑的专门著作，于是马寅初利用在浙江兴业银行当顾问之便，搜集大量中外资料，于1925年写成《中国国外汇兑》一书，介绍中外有关国际汇兑的基础知识和方法。1929年又发表了《中华银行论》，介绍了各种银行业务，如存款、放款、贴现、押汇、期票买卖、票据交换、发行钞票等，并对当时国内银行业务的状况和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这两本书在当时金融界、经济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1923年成立的“中国经济学社”，是我国最早的经济学学术性群众团体。此社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长期担任该社社长。社章规定：（1）提倡经济学的高深研究；（2）共同讨论现代经济问题；（3）编辑各种经济书籍；（4）赞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及改进。全国经济学界著名人士几乎都是该社社员。学社每年举行年会一次，预定专题，共同讨论，求得比较一致的意见，然后公诸于众。学社还发行了《经济学季刊》和几种学术专刊，对国内实业界和经济学界都有相当影响。作为社长的马寅初格外热心社务，对指导全社学术方向起着重要作用。

1927年以后，军阀势力控制了北大，马寅初遂离开北大南下，先后任杭州财务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兼浙江省省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委员和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长等职。

当时的南京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有求于江浙财团，在理论

上又是以资产阶级学说为指导，因而博览欧美经济制度的马寅初，当然特别见重于当局，因而被请去作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长。他在任职期间，一方面也为当局制订政策出过一些主意；另一方面，由于他刚直不阿，秉公办事，也常常和当局发生磨擦。不管是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还是孔祥熙当财政部长，他总是不为这些显赫一时的权贵的力量所屈服。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有关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提出修订关税等有损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法案，马寅初总是要挑剔一番。就是孔、宋亲自出席立法院会议，强作种种说明和辩解，他仍是不假辞色，作面对面的责难。有一次马寅初当面质问财政部长孔祥熙：为什么在法币贬值、物价上涨时不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造成财政上大紊乱，物价更加上涨，你用意何在？孔祥熙被问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①。由于他主持正义，不断地抨击国民党的弊端，因而遭到蒋介石及其党羽的忌恨、排挤和打击。

1932年后，马寅初在上海交通大学主持经济研究所工作。那时正遇世界经济危机日益深化，国内则因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导致农村经济破产，工商业凋敝，外资盘剥，入超激增，民众贫困，国力枯竭，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马寅初探究原因，写成《中国经济改造》一书，力图找到中国经济落后的症结，谋求解决之道。正如他自己所说：“国家忧患使余有勇气担任此著述”，“不得不在此风雨飘摇局势之下，觅得一对策也。”^②

① 潘伦：《马寅初先生面斥孔祥熙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1981年第73期第99页。

②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1月版，第2页。

1937年出版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是《中国经济改造》一书的续篇。《中国经济改造》注重在经济方面，而《中国之新金融政策》则侧重于货币方面。《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比较了各国货币制度的优劣，论述了汇兑本位制产生的原因和维持下去的主要条件。指出：币制的基础是财政，财政有赖于人民的富裕，而法币政策不过是一时融通的工具而已。

抗战爆发不久，马寅初到了重庆，着手创办重庆大学商学院并担任了第一任院长兼教授。他除培养经济理论和经济专业人才外，特别注重战时经济状况的研究。此时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营私和腐败，他疾恶如仇，思想日益倾向进步。他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要求抗战卫国，反对出卖民族利益；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四大家族的经济垄断；要求稳定币值，反对通货膨胀。1939年，他在立法院正式提出议案，要求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充实抗战经费。这样的提案在国民党控制的立法院当然是不可能通过的。但他并不甘心，继续进行演讲并发表文章，指出：“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①。“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之上。”“现在前线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头颅热血，几千万之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而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基于此！……故欲实行资本税，先须自发国难财者之大官始。”^②他奋力向社会呼吁：必须从速对发国难

① 马寅初：《战时经济论文集》，第282页。

② 同上书，第295页。

财者开征“临时财产税！”

马寅初要求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虽然是以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但是他的矛头所向，直指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因此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反动集团对此却惶恐万状，又恨又怕，先是以利禄引诱，高官收买，继而派特务以暗杀相威胁。这种种卑劣伎俩激起了正直爱国的马寅初的无比愤怒。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依然到处演讲。一次，他在重庆实验剧院演讲时，夫人挈子女一并到场，以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他说：“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应说的话就应大胆说出来，即因此牺牲也在所不惜。”^①马寅初这种仗义执言、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可是这却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于1940年12月下令逮捕了这位不畏权势敢怒敢言的马寅初。1942年8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营救下，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将他释放出狱，但仍然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寓所达3年之久，直到1944年冬，才获得政治自由。

抗战胜利后，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工商专科学校教授。此时他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在经济上反对通货膨胀和官僚垄断，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竭力主张发展民族经济。

1946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平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怒潮，被迫召开了政治协商

^① 《新中华报》1940年12月29日。

会议，达成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问题的协议。但是国民党政府只是作作样子，根本没有履行的诚意。同年2月10日重庆一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为了敦促国民党履行协议，在较场口召开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马寅初、郭沫若、施复亮等参加了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了军警特务，大打出手，造成了有名的“较场口事件”。马寅初与郭沫若等均被殴打，马寅初额部受伤，马褂也被撕破。但他毫不屈服，未等伤愈，第二天又与重庆一些学校的学生进行座谈，发表自己对政局的一些意见。

1946年2月4日，马寅初应邀在重庆中央大学发表公开演讲，题目是：《新公司法与官僚资本》。他在演讲中揭露那些丧心病狂的特权大官们，企图取消《新公司法》中对他们限制的条文，以便勾结外商，大发横财。他坚决反对少数官僚操纵国防最高委员会，强行取消《新公司法》中对外商“营业”的限制。次日重庆《商务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马寅初的演讲消息，6日重庆《民主报》又以《打倒官僚资本，热烈响应马老的呼吁》为题，发表了社论，表示支持马寅初的正义立场。

在国民党反动派点燃内战战火之时，马寅初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他常常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1946年6月，他同杭州十多所学校几千名青年学生一起游行示威，抗议伪行政院妄图决定给外国人以“内河航行权”，好让美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冲直闯，给蒋介石运送士兵和武器，帮助他全面打内战。在游行过程中，他带头高呼：“反对打内战”、“打倒官僚资本”等慷慨激昂的口号。

1946年9月30日，马寅初在上海经济团体联谊会上演说，痛斥官僚资本、封建买办与洋人勾结在一起，企图摧毁国内一切私营企业生产的可耻行为，指出这是走“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的殖民地旧路，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教^①。

1947年元旦，正当国民党公布伪宪法时，上海学生为了抗议美军暴行，举行反美示威。年近古稀的马寅初走在学生队伍的第一排，挥动手中的旗子，同学生们一起振臂高呼：“中国不是殖民地！”“美国兵滚回去！”等口号，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热烈支持。

同年5月，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阻止他前往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演讲，扬言马寅初敢去就杀死他。但马寅初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行前给家属写下遗嘱，毅然出席了会议，使特务为之无可奈何。

1946年马寅初还与八十多位进步教授定期集会，座谈当前时事问题，后来取名为“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这个“大教联”成立后，对当时政治问题发表过多次宣言，比如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伪国大与签订《中美商约》时，“大教联”均公开发表宣言加以反对；1947年全国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大教联”发表宣言大力支持。

1948年底马寅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处境已相当危险，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他化妆成一个厨师登船离开上海，经由香港转移到东北解放区，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解放以后，马寅初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

^① 《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日。

三届委员，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赞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爱戴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他以一个学者特有的专长，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言献策，先后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一方面热情讴歌新中国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总结经济建设经验，研究理论，提出建议。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制止通货膨胀、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过程中，他做了许多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五十年代初期，他发表了《我国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优越性和特点》、《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的特点》等文，阐述了社会主义财政预算与资本主义财政预算的本质区别。1955年，我国发行新人民币，他撰写了《新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及其优越性》一文，用不同社会制度下新旧币制对比的方法，论述了我国货币改革的重要性及其意义。

在私营工业企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他完成了《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论述了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该文从当时党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程和存在的问题出发，揭露了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分析了原因，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其中许多分析是中肯的，有预见性的，也是符合党的政策和要求的。

1956年到1958年，马寅初陆续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和《我的经

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论著，对控制人口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积极的意见。他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是个极大的负担”。他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推迟结婚年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不能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必须同时发展轻工业，积极发展农业，也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等等。他以赤诚之心，针砭时弊，但当时却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康生、陈伯达的策划煽动下，学术争鸣竟变成了政治讨伐，自由讨论变成了文字围剿，什么“中国的马尔萨斯”，“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帽子一齐扣来。面对这种错误的批判，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为了真理，宁折不屈。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刀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论说服的批判者投降”。“我从不考虑个人和名利，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为了真理，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充分表现了一个社会科学家维护学术尊严、为真理而献身的非凡勇气和高尚品德。1960年3月，马寅初愤然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随后也离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1960年以后，在长达20年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中，马寅初仍然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利用一切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积极向各级领导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他对五十年代末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个人崇拜苗头提出了诚恳的忠告，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唯意志论的倾向深感焦虑，对于少数干部中出现的特殊化、脱离群众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

样下去，将损害党的优良传统，毁坏党的前程。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由于周恩来总理千方百计的保护，马寅初才免遭林彪、江青和反党阴谋家康生的毒手。1972年，91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又是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亲自过问，才使他有可能经过手术重新获得健康生活的条件。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中央的直接关怀，1979年9月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彻底平反，肯定了他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推翻了强加于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恢复了名誉，教育部又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这位饱阅人间沧桑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无限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能有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实事求是地为曾经批判错了的人平反，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大有希望，也证明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愉快地接受北大名誉校长的任职。我对党中央表示崇高的敬意”。

1981年2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一致推举这位曾为我国人口科学作出过杰出贡献的百岁老人为名誉会长。同年3月，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又推选马寅初为该会顾问。1981年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马寅初是中国代表团的名誉顾问。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特意向马寅初教授赠发表彰信，称赞他几十年来在人口研究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81年6月24日，是马寅初百岁诞辰。他曾战斗过的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都为他举行了庆祝活动。浙江大学出版了设计精美的《马寅初先生百岁寿辰庆贺会文集》，

重庆大学专门重建了早已塌毁的“寅初亭”，供后人瞻仰纪念；北京大学召开了有六百多人参加的庆祝会，同时还收到国内外送来的贺信、贺电、寿词、寿诗、寿联、寿画一百余件，人们用热情洋溢的颂词，赞扬这位百岁老人的战斗业绩。许德珩副委员长赠送的寿词写道：“百岁期颐，学界泰斗。桃李满园，循循善诱。深谋远虑，国家人口。松柏长青，谨以为寿。”教育部的贺信上说：“祝您几十年来为祖国教育事业、经济建设事业、学术研究工作做出的积极贡献，学习您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护青年一代的可贵精神。”1981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出版的《人口简讯》特意刊文赞颂马寅初是“节制生育之父”。这一切都表示人们对马寅初怀着深切的敬慕之情。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因久病不治，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101岁。5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他的生前友好400多人向马寅初遗体告别。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由家属安放到马寅初的原籍浙江省嵊县。

马寅初的一生是不断前进的一生，是饱经风霜、历尽坎坷、追求光明、坚持真理的一生。他的百年阅历，正是我国正直爱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典型缩影。在政治上他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的民主战士。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他逐渐认识和靠近了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又得到了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自1939年开始“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解放以后，他继续跟党走，为党出谋划策献逆耳忠言，成为中国共产